
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述评

· 魏宏运 ·

一、近年来，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已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近年来已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

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从抗日根据地存在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一些学者、新闻记者发表的报导性作品，如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陈克寒《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视察记》（新华日报馆1939年版）、李公朴《华北敌后》（山西太行文化服务社1940年版）等书，就具有史学价值。开创根据地的领导者所写的各根据地史略，更是重要史料，如聂荣臻《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939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根据晁哲甫、杨得志、王从吾、徐运北等人的座谈所写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1944年，见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1944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概况》，对各根据地的范围、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及发展壮大的过程，都作了概括的阐述，写出了它们的特征，是一本经常为人们参考的著述。1953年该书重印时，补写了“陕甘宁边区概况”一章，书名改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

50年代和60年代，“左”的思潮影响了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学者们很少涉足这一领域，出的成果不多。公开出版的只有齐武

编著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河北军区政治部编的《冀中抗日战争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穆欣《晋绥解放区民兵抗日斗争散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资料文献仅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有关的文章多侧重于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民兵斗争，其史料来源和研究题目有相互重复现象。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关的文章，据李光一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论著书目索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统计，有400余篇。研究者的视角大大扩展了，不再局限于以前几个问题，而是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资料集、论文、专著层出不穷，是过去几十年所未见的。

在新的著作中有很大影响的是当年根据地创建者领导者的著述及回顾，他们的思想感情驰骋于那伟大的民族战争年代，当年艰难奋斗的历史与个人的生活思想融汇一起，以自己的实践和经历，展示出历史的各个侧面，抓住了关键的事件，揭示了历史的进程和民族的命运。这些著作都反映了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如《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抗日战争部分，《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杨成武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片断回忆》（《财政》杂志1984年1—12期）等等。

专门研究抗日根据地的书籍也和读者见面了。如吕树本等《浙东革命根据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廉《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应兆麟主编《皖江抗日根据地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魏宏运、左志远主编《华

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根据地史的研究已扩展到一些新领域，其成果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朱绍南等著《淮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王剑青等主编《晋察冀文艺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谢武申编著《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区反顽斗争概况》（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

对创建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在这方面，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是一部最有权威的著作。以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斗争史实为内容的《大江南北》杂志已问世好几年了。

众多的研究是从编写根据地纪事和大事记起步的，首先着力追寻根据地发展的脉络和线索，如《八路军总部大事纪略》（李志宽、王照寰编，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魏宏运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太行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述》（中共山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3年编印），《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编委会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冀东革命史大事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许毅、星光于1981年开始组织和领导各地财政部门，会同档案馆和有关高等院校，展开的对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研究，计划分别出版资料选辑和专著，工程浩大。资料内容包括总论、农业、工商业、财政、金融诸方面。此项工作无论从文化积累还是从科学角度来讲，都是很有价值的。现已出版的资料有：《抗日战争时期陕

《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共九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晋察冀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共四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共六册（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1985年印），《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共四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东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税收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

把目光集中于资料搜集和整理，是有远见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档案文献和资料，相当分散，已经遗失的姑且不论，就是现存的资料也极其零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档案馆均有保存，各地博物馆、文管所也珍藏着一些。不少资料是绝无仅有。如《边政导报》、《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材料》、《边府通讯》、《太行区银行工商工作参考资料》、《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等等。它们必须尽各地所有互相补充方能基本上凑齐，有的至今还未搜集齐全。当时曾出版了很多杂志，包括内部的和公开的，能于今天集中出版流传下去，为后来者以可寻的轨迹，确有其历史价值。财政部科研所在此项工作上走在了前头。

从事于资料整理并见成效的，还有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辑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共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出5辑），镇江地区茅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编《新四军在茅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人民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档案出版社），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资料选编》4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上、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计23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其中包括不少抗日根据地的文献资料，到目前为止，该丛书已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第一册（上、下）、《苏中抗日根据地》、《苏北抗日根据

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淮南抗日根据地》、《苏南抗日根据地》、《皖江抗日根据地》等等近十种。

根据地档案资料的出版，促进了根据地历史研究的发展，相当多的文章引用了已发表的档案资料。已发表的 400 多篇关于根据地的论文所论及的问题，有的是第一次提出，有的是对历史问题重新认识。新的史料、新的方法、新的见解不断涌现出来，研究者正在做着非常有价值开拓性工作。

根据地史的研究已成为一些单位的主攻方向。南开大学近现代史学科重点任务之一，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革命根据地。南京大学的革命根据地研究所则集中全力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的专门学术讨论会也相继召开。财政部科研所曾先后在洛阳、唐山、黄山、大同、石家庄组织了多次学术会议。规模最大的一次，是财政部戎子和，科研所赵秀山、星光组织的1984年太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当年从事晋冀鲁豫边区财经工作的老同志。研究该地区财经工作的科研人员，也吸收了一些学者，会议共进行了七天，开得很成功，集中讨论了十二个问题：（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根据地中共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变化情况；（二）1940年边区政府成立以前，各根据地（如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创建过程中对日寇斗争形势及国共摩擦情况、政权建设和财经工作情况；（三）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行政区划的变迁、政权组织（包括各级参议会）的发展变化和主要负责人的变动情况；（四）对日军及国民党（蒋、阎）在政治和经济斗争中所采取的不同斗争方针和实施的情况；（五）1938年春粉碎日寇的九路围攻，1940年的百团大战，1942年夏的反扫荡和日本投降后诸战役，对边区的开创、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对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影响；（六）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在和敌人的斗争中，在财政经济工作中采取了哪些措施粉碎日寇的扫荡和经济掠夺；（七）边

区各地贯彻执行土地使用条例，减租减息的情况以及组织生产救灾，开展农业生产互相合作和大生产运动的情况；（八）边区的工业生产；（九）对重要的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统制贸易，各个不同时期在进出口贸易政策上采取的措施；（十）边区的财政；（十一）边区的金融工作和物价问题；（十二）对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评价问题。会议的讨论发言，已由财政部科研所汇集成《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一书出版。1984年12月，冀鲁豫边区财经史座谈会在山东曲阜举行，讨论了该地区财政经济的若干问题。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也举行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如芜湖会议，讨论了皖南事变；镇江会议讨论了政权建设和财经问题；武汉会议讨论了党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等问题。关于晋绥、晋察冀、冀南、冀东、冀鲁豫等根据地的专门学术讨论会，也举行过多次。以上情况说明了根据地史的研究已进入高潮。

根据地的研究不限于国内，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将注意力投向这一领域。1984年8月1日至4日，南开大学召开了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中外学者90余人参加（国外学者30多人，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会议着重讨论了抗日根据地形成的特点，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三三制政权与中国民主化的关系，知识分子在抗日根据地的作用诸问题。这是我国首次举行的根据地史国际会议，它推动了根据地问题的研究。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唯一取得胜利的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人们对这个伟大时代的回忆、记述和分析，使这个时代的全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将激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历史工作者决心把被错综复杂的现象所掩盖的本质客观正确地揭示出来。现在活跃的研究局面，仅仅是个开端。历史的富有活力的研究，总是和时代一同前进的。

二、关于若干问题的探索、争论和评价

这里概述几个主要问题。

(一) 关于动员委员会

近年来段云等人写的《抗日初期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1986年11月2日《人民日报》),程子华写的《纪念“战动总会”成立五十周年》(1987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李代玲、鄆碧云写的《“动委会”及其历史作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对这一组织作了系统的论述。

关于“动委会”这一组织的进步性,洛甫在其成立的第三个月就分析了它的宣言与工作纲领,讲到这一组织成立后,山西政治形势表现了一种新生的气象,同时也谈到阎锡山的保守性。1939年战地动员会汇编了各项工作总结,名为《战地动员——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会斗争史实》(上、下册),内容极其丰富,现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重印,是研究这个组织在山西、绥远、察哈尔战区活动的重要资料。

段、程等人的文章着重论述“动委会”成立的历史环境、这一组织的性质及历史作用。程文说它是典型的以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共合作为基础,并有各方爱国人士参加的带有政权性质的权威性的机构,它有明确的管辖区域,又有发动群众、代行政权职能、组建抗日武装、指挥武装部队作战的职权。段文谈到“战动总会”在动员人民参军和从各方面支援抗日部队的同时,还协助中共北方局,协助牺盟组织,带头在各县、区、村建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抗日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开展农民、青年和工人运动,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反对封建势力和旧的思想习俗,并组建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协调战地各种力量。上述两文讲的是晋绥根据地动委会的历史。华北各根据地创建初期都有类似这样的组织。晋察冀根据地是1938年1月边区政府成立之后结束各地“动委会”的。冀

南的“动委会”一直存在到1940年，国民党曾禁止它发展，但它走完了自己的道路，直到完成了历史使命。

（二）关于游击战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当年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发表过很多深邃的论述。那时也出版了很多论述游击战争的书籍，如由毛泽东、陈昌浩、刘亚楼、萧劲光、郭化若等执笔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1939年延安解放社），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延安解放社），张冰之编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与经验》（1938年中外编译社）等。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课题，则是近年来的新气象。研究者神往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撰写了一批文章，有的已公开发表，有的在各种会议上宣读过。何理《论抗日游击战争及其历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4年3期），张国祥《论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两个问题》（《晋阳学刊》1984年2期），杨圣清《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1984年4期），卜力《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党史资料与研究》1985年4期），莫阳等人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问题》（《军事学术》1985年8期），王秀鑫《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历史教学》1985年12期），李增光《人类战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一幕——论敌后战场游击战思想的特色》（《中国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杨牧等人的《试论抗日战争中我军的战略方针》（1985年中国现代史学会第二次代表会暨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等，都属于这方面的专题论文。

游击战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发展密切相关。王秀鑫的文章称，1937年9月至1940年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开创抗日根据地。1941年至1943年秋是第二阶段，主要是保卫和巩固抗日根据地。1944年以后，游击战逐步转变为运动战。

各根据地的游击战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山东的游击战是在各地暴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汉本《“三山”起义与山东抗

日根据地的创建》，《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平西游击战争是主力部队挺进军到达后打开的局面。(孔宪东、荣国章《北平郊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浙东游击战争，因地理和历史条件，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利用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的名义进行的。(金普森《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华侨和港澳同胞给了很大支援，有的游击队的主体就是香港的海员、工人和学生。(梁山《华南抗日根据地概况》，同上书。)

有的文章还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和历史眼光，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心所在。游击战争创造了根据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没有游击战，就没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关于减租减息

近年来，不少文章论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问题。

二五减租，也称三七五减租。这一政策是1926年10月国民党联席会议提出的，1930年南京政府公布的土地法重申了这一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它在浙江、湖北推行过，收效甚微。真正使这一政策付诸实行的是抗战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共产党顺应形势的变化，由没收地主的土地转变为减租减息。肖一平、郭德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4期)一文中说，这一政策是革命与改良相结合的政策，它的革命性表现在是为全民族利益的，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争取地主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有利于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它的改良性，表现在它只是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和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

已发表的文章，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村根据地战前的经济结构。论者一致认为土地集中是普遍现象，惟集中的程度各地区有差别。《1943年北岳区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材料》、1944年《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是研究华北农村经济结构最珍贵的资料。《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中讲，太行区的土地是比较分散的，中农的比重较大，其户口比例与土地的比例相差不多。富农也较发展，农民的破产也不严重，尽管这样，地主阶级仍占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加上富农就垄断了二分之一的土地，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各种剥削。对晋察冀北岳区28个县88个村的调查表明，抗战前农村总户数将近一半（即47.47%）的贫雇农，每户平均只有2.5亩至7.5亩土地，而占农村总户数不到2.3%的地主，每户平均耕地高达97亩。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了租佃关系，认为各地基本上都是封建式的，地租形态为实物地租。部分地区残存着最落后的力役地租。晋东北及雁北“打伙计”的租佃形式可能是农奴制度残余的代表。至于剥削的程度，一般在收获量的40%以上，有的高达70%或80%。高利贷利率也极高。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超经济剥削手段。阴署吾、贾宗荣、沈长山在《盐阜区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一文中说，地主“对农民进行苛重的地租剥削，租额一般是主佃六四分。地主除按约收取地租外，还进行种种额外剥削，如拖打田、上庄田等”。（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新论》，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杨福茂执笔写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工作略述》中讲，“浙东地区的租率一般占最高收获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此外，农民还要承受其他各种名目的封建剥削，例如，提供各种副产和劳力，有‘租船’‘脚夫’租力等，还有田婆饭、戏租谷、谷小利……，算上这些附加的杂租，农民辛苦一年的收成就所剩无几了。”（浙江省财政厅，杭州大学历史系，浙东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编写组论文。）

2. 减租减息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变化。有的文章分析了减租

减息前后农村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租佃关系的变化，农民生活的变化，得出的结论是：地主和贫雇农这农村中的两极大为缩小，土地所有权由非生产者向生产者手中转移，查出的瞒地、黑地得到适当处置，地主阶级势力削弱了，阶级关系发生变化，随之租佃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杜晓《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建设》中讲，太行区租率一般减低了，超经济剥削基本上被废除了，租佃形式出现了单一化，大都定为死租，即佃农有永佃权，租期多为五年以上。（见《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孔永松《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特殊政策》一文中说，农村经济出现了一个积极变化，就是有的地主部分或全部出卖土地。放弃封建剥削，投资商业、工业或运输业，转向资本主义经营，使七分封建主义变成七分资本主义，这种转化是有特殊意义的。（见《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3. 减租减息与农民参加抗战的关系。这是历史学者讲述最多的一个问题。减租减息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好处，这就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朱绍南《淮北人民对抗日财经工作的贡献》一文中以1942年为例，说明减租减息后每人平均多得一石六斗粮食，农民受惠于减租减息。凭借减租减息这个经济杠杆，奠定了抗日财经工作的可靠基础。（见《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前面谈到的孔永松文，用数字说明农民在人力、物资方面的贡献，参军参战非常踊跃。

4. 减租减息要反复几次才能完成。各根据地减租减息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分阶段，反复几次进行的。许多文章都谈到如下几点：（1）减租减息需要一个发动过程，使农民觉悟起来，不少地区先搞试点，逐步推广。（2）减租减息比分配土地还要复杂、曲折，它是根据各地情况逐步开展起来的。这从各地公布的那么多条例中可以说明。刘健清《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概括地讲到该地区贯彻减租减息的过程。（见《抗日根据地

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3) 地主阶级的顽抗是最重要的原因，地主以夺佃、定租转活租、出卖土地权利等手段对抗减租减息，于是出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拖延不减或明减暗不减。

5. 关于执行政策中出现的“左”右偏差问题。“左”右的现象都发生过。一些地区开展不力，是右的思想束缚造成的。农民发动起来后，也有不交租不交息，不承认地主有权收回、转佃、出卖土地的权利。怎样保证农民交租交息，是国外研究者很感兴趣的问题。1984年3月笔者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演讲，听众特别提出了这一问题。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左”的倾向发生与条例不完善有关。修正完善条例后，地主权益得到保障，原先逃亡的地主便纷纷返回。张洪祥《论抗战时期北岳区减租减息运动》，较全面地讲到这一问题。(见《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日本学者田中恭子写的《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用激进和温和这种概念来评估晋察冀的减租减息运动。她认为，1939年上半年出现的激进政策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许多地主和富农被迫逃往日占区，并与日伪合作，进攻解放区。她的很重要的观点是：“当军事和经济状况处于紧急关头时，政策比较温和，但当状况好转时，政策就变得更激进起来。思想因素似乎对激进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同上书)看来，这一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讨论下去。

(四) 关于人民的负担

近年相当多的人研究根据地的财政问题，特别是人民负担问题。一些年过花甲的老同志，以自己的亲历，撰写了一批文章，为这一课题增添了光彩。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片断回忆》(《财政》杂志1984年1—7期)，周政新《冀中区抗日战争时期后三年财政工作的回顾》(《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10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4年编印)，就属于

这一类著作。其显著的特点，一是作者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一是对政策形成的描绘，这是一般研究者无法做到的。因为他们当时是财经工作的主持者，政策的制定者，对政策的产生，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及当时如何权衡利弊，选择最佳方案，最后定夺的全过程最清楚，他们对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的说明最真实，分析最生动最权威。研究者的文章，涉及的范围广泛，如财政收入状况、财政制度的确立、供给标准、统筹统支、精兵简政、人民负担等。

关于人民的负担问题，也就是税收问题。由于战争的消耗和生产力的低下，一般来讲，负担是比较重的。怎样的负担才算公平合理，负担政策是如何演变的，这是研究者很感兴趣的。如星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农村负担政策》，冯田夫《一切为抗日的晋察冀边区财政》、董风熙、王一涵《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财政》，王晋三《太岳区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简况》，韩哲一、边裕鲲等六人写的《冀鲁豫根据地的创建和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李树萱《晋绥边区财政问题的探讨》，卢世川《山东抗日根据地财政的创建》，以及淮北、淮南、皖江、鄂豫边、东江和华南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的专题论文，都触及到人民的负担问题（见《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姚良虎、田酉如《抗战时期太行人民负担政策的演变》（《山西党史通讯》1987年1期），笔者写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政策》（《历史教学》1985年11期）也是论述这一问题的。

抗战初期，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等地实行的是合理负担，冀南、冀鲁豫、山东等地实行的是公平负担，南方的一些根据地也是合理负担。这一政策，多数群众是拥护的，它比战前按田亩平均摊派有很大的进步，照顾了各阶层的负担能力。但不可讳言的是，在制定合理的具体政策上，不少地区一度发生“左”的偏向，主要表现在累进率过高，使负担大多集中在地主富农等富有者身

上。从专区到各县各自为政，自定规章，随收随支，负担面有的地区只有20—30%，个别地方只有10%，70—80%的农户基本不负担公粮公款和公草。星光文章中的论断是：这就出现了另一种不合理的情况，有的地主将全部或大部地租交了公粮公款，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影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有的地主逃离根据地甚至投向敌人。这固然有其他原因，但过左的负担政策也是一个因素。

为使负担真正合理，即负担人口达到全村人口的80%左右，是经过了几年的认识过程，经过广泛的争论和调查研究，反复测算而后才确定下来的。戎子和及董风熙、王一涵写的文章特别讲到这一点。

在税收政策上，1941年晋察冀边区创立了统一累进税制度，将农业、工业、商业合并计算，负担面达到80%左右，被认为是税收的一大进步，保证了财政的稳定，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削弱了封建经济，受到了称赞。此后，各地相继效法，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制定了统累税条例，使税收和负担政策达到了完善程度。

不少文章都讲到完成税收是一非常艰巨的任务，完成的好坏，一要靠政策的正确，二决定于群众觉悟的程度。政府和人民群众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是有矛盾的。人民负担过重时总会有怨言的，甚至很尖锐。政府必须考虑到人民能负担的程度。各根据地从实际中，得出了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结合的方针。戎子和在其文章中实事求是地记述一件事，就是1941年太行区派公粮重了一点，农民叫苦，黎城曾发生一次离卦道暴乱投敌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借口是公粮重，负担不起。边区政府冷静地考虑了这一问题，接受了这个教训，从1942年起，就着手减轻人民负担。这说明政策的趋于完善，有时也要付出代价。正确的东西常常是从错误中总结教训而得出来的。

有的文章从精兵简政方面来探讨人民的负担。周文龙《晋冀鲁豫根据地创建时期我军后勤工作的有关情况》（《抗日根据地

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可以说是一篇代表性的著作，值得一读。

（五）关于百团大战

对于发生在1940年8月22日至12月5日的百团大战，过去是史学的“禁区”。战役的指导者彭德怀曾因这次战役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文化大革命中这次战役成为他的主要“罪状”之一。近年来史学界对此重新估价，仍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民族解放史上永远放着灿烂的光辉，应当歌颂；有的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一次错误的战役，暴露了自己的力量造成了革命的曲折。笔者1984年在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作学术报告时，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评价特别关注。研究者所发表的十余篇文章，视线多集中于对这一战役历史作用的探讨和阐述。研究的方法都是将其放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全局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背景中来考察。研究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论争和交锋的意见，大体上可分三大类。第一类是全面肯定的；第二类是肯定其重大意义的同时，也指出其错误和缺点；第三类认为百团大战没有必要发动，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少。

对于百团大战历史意义的评价，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何理、蒋杰等多数人都认为百团大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粉碎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克服了重庆方面出现的投降主义危险，粉碎了日本“迅速解决中国事件”的梦想，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见何理：《论百团大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南开学报》1982年3期；蒋杰《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79年1期。）王中兴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分析，认为百团大战推迟了日军南进政策的实施，为英美赢得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破坏了日军配合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战略计划，加重了日本的困难。（见《略论“百团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军政治学院学报增刊《军

争论有以下几点：

1. 百团大战是否忽视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紧密结合。蒋杰在文章中讲到，百团大战用减轻敌人对正面战场的压力来稳住国民党，反映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疑惧。只强调集中主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忽视了敌后战场我军力量的保存和发展，忽视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紧密结合。这种论述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金春明认为，抗日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蒋介石参加抗日，没有投降，这对全民族和整个抗战有利。因此，我们必须拉住蒋介石，拉住的时间越长越好。如果说这是保卫蒋介石的话，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见《还百团大战以本来面目》，《辽大学报》1976年6期。）张洪祥、高德福也认为，蒋杰的看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当时发动百团大战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作战（事实上当时正面战场也无激烈的战斗），而是为了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也是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囚笼政策”，谋我军的巩固和发展。（《关于百团大战的评价的几点商榷》，《南开史学》1980年2期。）百团大战吸引了大量敌军兵力于华北敌后战场，此后八路军的压力显然大大增加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实。

2. 关于如何估计百团大战前形势的问题。百团大战的发动者对形势估计正确与否，关系到这次大战是否应该发动，发动后是否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多数文章对此持肯定态度。战前法西斯投降、英国退出欧洲大陆，德意法西斯得势，鼓舞了日本加紧对重庆国民党政权政治诱降和军事压迫双管齐下的政策，国民党有可能倒退而投降。《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指出，空前的困难与空前的投降危险快要到了，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抗日战争主力的八路军采取攻势是必要的。战役的结果也达到了这一目的。关于这一点，也有不同的看法，李新认为：“为了坚持抗战是应该给敌人以打击的。但最好的办法是让日本人

先跟蒋介石打起来，然后我们再帮助蒋介石，这样就拉着蒋抗战了，就不至于我们在那里打“百团大战”，蒋介石却在一旁坐山观虎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还有一种意见，对百团大战全然持批判态度，朱锡通《关于百团大战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4期）认为，此战无论从对形势的估计，战役的要求和目的，或是从战役的结果来看，都是错误的。

3.百团大战是否超越了战略防御的限度。这是一个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有人认为，百团大战是使用华北我军几乎全部力量以战略进攻的姿态进行的，越出了敌后战略防御的限度。采用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攻坚战，是与毛泽东提出的而为中共中央确定的持久战思想，和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相违背的。结果我军减员大，而破袭的铁路攻克的据点，大多数又被敌人夺去，胜利成果未能巩固。何理则认为，百团大战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战役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军作战史上极其宝贵的财富。（见《论百团大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及历史作用》，《南开学报》1982年3期。）刘家国认为，从百团大战总体来看，并没有违背我党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战略方针，游击战是主要作战形式，又有运动战，既有进攻，又有防御等多样的作战形式。（《百团大战是否违背了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思想战线》1985年增刊3期。）金春明举了敌我伤亡的比例，指出我军与敌军伤亡的比例是3：7，较抗战开始三年的1：2为低。他不同意百团大战不顾条件、硬性攻坚，我军损失太大的说法。这两种意见分歧较大，难以接近一致。

4.百团大战是不是造成了1941—1942年根据地困难？百团大战后不久，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我军遭受重大损失，百团大战是否是它的直接原因？对这一

问题，研究者的看法很不一致。只要浏览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就会发现，有的认为百团大战引起了敌人的报复；有的认为形成极端困难的局面，根本原因是日军确保华北占领区的战略方针和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的，但百团大战军事上的错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有的则认为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金春明说，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很多，百团大战不过是直接导火线而已。早在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就把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解放区，而国民党的封锁包围又是造成解放区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对百团大战的看法众说纷纭，说明了学术界思想的活跃，过去统一于一种观点的做法不再为人们所接受了，人们已和过去表面上一致的传统基本上决裂。

（六）关于皖南事变

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史学工作者和作家近年来研究的热门课题。中央档案馆公布出版了《皖南事变》的资料选辑，各种报刊，诸如《党史研究》、《党史资料征集通讯》、《安徽史学》、安徽《社联通讯》、《安徽师范大学报》等刊登了许多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章，以皖南事变为题材的小说《皖南事变》也出版了，许多人还到皖南事变发生地作实际考察。皖南事变的研究深入得多了，这是可喜的现象。

有的文章着重探讨皖南事变这一悲剧的主观原因，有的着力于客观因素的分析，视角不同，结论也迥异。黎汝清的小说《皖南事变》发表后，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安徽党史学会、《安徽党史研究》和《安徽史学》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对小说中违背历史事实的虚构提出了批评。

从发表的文章看，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1.皖南事变是否可以避免？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曹雁行、蔡霆光《皖南事变始末》（《党史研究》1982年1期），马芷荪《对考证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的一点意见》（《党史研究》1982年4期），黄开源等《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

训》(《安徽师范大学报》1981年3期)，王秀鑫《关于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功过问题》(《党史通讯》1986年11期)等文，都认为无论新四军走还是不走，也无论是走哪条路线，蒋介石都要“务求彻底肃清之”，“务于长江两岸歼灭之”，这是问题的实质。马芷荪的文章说，“如果认为新四军服从蒋介石关于改造的命令，从铜陵、繁昌间渡江，皖南事变就不会发生，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2. 北移路线问题。《皖南事变》小说认为新四军转移路线是由项英个人决定的，王秀鑫文中认为是新四军军分会集体决定的，陈辽《皖南事变历史和皖南事变小说》认为北移路线是叶挺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并为中共中央所同意的，王明亮《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路线究竟是怎样确定的》一文认为，不存在中共中央军委同意的事实，中央军委的文件涉及北移路线时对项英始终持批评态度。

以往所讲的“三山计划”(即向天目山、黄山、四明山南进的系统计划)说也遇到挑战，王秀鑫文章中讲，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资料足以证明有这一计划。

3. 关于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所受损失的责任问题。多数文章认为项英应负主要责任。如曹雁行等人说，项英始终不肯放弃其南留的打算，下不了北移的决心，而且还一再向中共中央请示方针，从而拖延北移，结果在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之下，招致了重大损失。王秀鑫则认为，当时情况复杂，中共中央在确定北移方针后，由于对皖南的情况不可能深入具体地了解，因而对于何时北移最为恰当，未能规定具体时间，即使规定了，又有所变动。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据此，她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严重损失的责任归咎于项英。项英在掌握北移时机、选择北移路线及应付国民党的进攻方面都有错误，但中共中央也有一定责任。

4. 对皖南事变中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如皖南事

变时间的考证，傅秋涛突围路线和突围人数的考证，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离队的原因，项英、周子昆被害问题，叶挺谈判被扣问题，刘厚总叛变投敌问题等等。

皖南事变是一复杂的问题，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这一历史事件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已经发表的一百多篇文章，引用不同的史料，或者是对同一史料的不同解释，论述这一事变的各个侧面，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历史知识，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皖南事变研究的活跃，反映了史坛的繁荣和发展。

（七）关于三三制政权

研究者发表了一些论文，追踪三三制的历史轨迹，诸如它的产生，它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它的强度和威力等。

三三制思想的产生是有重大历史根据的。探究它，应从客观事实中去寻找，而不是从谁的头脑中去发现。陈志远、王永祥对这一政策思想的来龙去脉作了概括的描述。他们从考察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出发，得到了合乎规律的认识，认为，晋察冀政权的结构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并巩固和发展这种人民广泛动员起来抗日的革命局面，及时总结并提出三三制思想，以便把敌后抗日政权的建设统一化、规范化和制度化。1940年3月，中共中央、毛泽东明确提出三三制原则。（《抗日根据地政权“三三制”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野泽丰认为，三三制是克服因国民党制造的磨擦日益增多而产生的极左倾向的一种办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根据地》，同上书。）施善元认为，那是为了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顺利开展抗日救国斗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通过以上这些穷根究底的研究，我们就知道，三三制是时代的产物，它和抗日战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研究者以大量的事例说明三三制思想是怎样深入到人们思想中，得到各个阶级的拥护的。各根据地的选举都很庄严热烈，有广大群众参加，绝大多数地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在90%以上，这说明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笔者50年代初，曾写了一篇短文《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历史教学》，1953年），论述了群众的觉醒，选举的民主化程度。近年来，研究者发表的文章中，历史资料更充足了，研究也更深入了：不是简单地概述选举过程，而是通过一些过程的连续系列，探索其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阐述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以及抗战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

有的研究者还探讨了三三制政权的强度和生命力，论述了各党派各阶级如何携手抗日，使民主政权机构建设适应于他们的需要和理想，以及在工作中所表现的革命勇气和决心。

从已看到的历史资料中，各根据地的各级政府都是很精干的，有效能的，并且是廉洁的。民族解放事业促使人们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不断接受新思想。各级政府机关，一扫过去旧时代的官僚制度和衙门作风，它们是真正的人民的办事机构。高德福《论晋察冀边区政府建设中的民主政治》（《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突出地讲到为政清廉，各级政府肃清了很多为“混事”、“作官”、“发财”而来的行政人员，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使边区军政民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整体。

在历史研究中，一个问题的研究常常引起很多新问题，三三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必然会有更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它。

（八）关于商业贸易

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是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新课题。根据地地处农村，又多为偏僻山区地带，是现代工业尚未发展的地区，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过去依赖于城市供给的工业品

十分缺少。因此，根据地的商业贸易就显得异常重要，它关系到军工供应，关系到军民日用品的供应，关系到对敌的经济斗争，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计。根据地商业贸易情况究竟如何，成为探索者考察的一个重要对象。已发表的论文，已涉及根据地的商业组织系统、商业政策的演变、市场、物价、货币购买力等诸问题。我们从中了解到，南方根据地工商业发展程度较北方为高，而北方在极艰难的基础上却创出了新局面。郭今吾写的《晋冀鲁豫边区的公营商业》，武博山的《太行区六分区财经工作的片断回忆》及笔者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经史》书中的商业部分，黄安的《略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商业》等，都表述了那个时代的商业特点。

各根据地都建立了商业贸易机构，边区、行署、专署、县都有贸易局，公营商店，运输、消费、信贷等类型的合作社，开辟并保持着一定的经商路线，团结商人，恢复原有集市，并建立了一批新市场，形成了有组织系统的商业网。这是根据地极为重要的经济现象。郭今吾说，当时商业工作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开展物资交流、平抑物价、调剂有无、巩固冀钞、支持根据地的生产发展、保障军民生活资料的供给；二是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从物质上充实自己，削弱敌人。这里所讲的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情况，其他根据地也都是这样。

根据地商业贸易的政策是：对内自由，对外统制。研究者具体地描绘了所研究的地区这一政策的实施情况。当时每一根据地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每一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再现在人们面前的商业活动也是千姿百态。各地区都兴办了一些工厂，促进生产，发展商品流通，按照传统的集市贸易，使货畅其流。政府的商业部门根据各种物资的供求状态和物价变动情况，有计划地调剂商品，以保持物价的稳定，活跃农村市场。如晋察冀边区，将雁北的粮食运到冀西，冀西的布匹运到雁北；冀中的土布棉花运到冀西，冀西的牲畜、硫磺及其他山货运到冀中。晋

冀鲁豫边区，将冀南的土布、小盐运到太行山区，太行、太岳的粮食及山货运到冀南。物资交流的开展，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当时出现了很繁荣的市镇。武博山的文章中讲到，武安的“阳邑镇当时有山货栈二十余家，棉布杂货店有四十余家，经商的人口有三千多，超过了该镇的农业人口”。黄安的文章讲到淮南“根据地内商贩遍布各地，如铜城的商店林立，有私商铺一百多家，各地来此经商的商贩很多，流动人口常在一千人次以上，号称淮南的‘小上海’”。这说明对内自由的贸易，是取得了积极成果的。各根据地对外贸易，在开始一段时间，几乎都出了些毛病，那就是对敌占区采取了简单的贸易封锁政策，实行经济绝交，以防止根据地物资资敌。这样做的结果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因边区界线与敌伪势力犬牙交错，敌占区缺乏物资，价格上涨，走私活动猖獗起来。根据地物资不断流向敌占区，却没有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根据地出产的土特产也运不出去，阻滞了经济的发展。郭今吾认为，这是贸易工作中的幼稚病。其他的研究者也都持相似的看法。1940年黎城会议提出在全边区范围内征收出入口税，统制对外贸易，对输入、输出物资分别实行“奖励、限制、禁止”的区别对待政策，对敌贸易便出现了主动的局面。相当多的文章都论述了各根据地是怎样在和敌人经济斗争中搞活经济的。

对敌经济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粮食斗争。各根据地对粮食及其他重要物资严禁外运、私运，如有发生，以资敌论处。后来将绝对禁运出境改为专卖出口，并加强缉私工作。各地专卖什么物资，根据各地具有的优势来确定。如晋察冀、晋冀鲁豫实行粮食专卖，因为粮食是敌人掠夺的主要对象，在根据地内，是带有半货币性质的一种商品，粮食价格的升降，往往成为各种商品物价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对货币的巩固，起着巨大的杠杆作用。粮食专卖，在内部仍自由交易，对外有计划地出口一部分，以换回重要的必需品。山东根据地则以盐和花生油为专卖物资，来

打击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经济掠夺，保护根据地的经济，促进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因为粮食战是尖锐的经济斗争，一些学者把目光投入这一课题。左志远写了《抗战时期太行区的粮食斗争》，傅尚文写了《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粮食战》，前面提到的郭今吾的文章，都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在论述中，研究者对1941、1942年太行区的粮食斗争，进行了科学的、心平气和的总结。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问题。太行区西边白晋铁路沿线是粮食产区，平汉线粮食不够，历史上，太行山的粮食就由西向东流动。根据地贸易部门便抓住了这一形势，从西线购买粮食到东线去出售，获得了大量的外汇，群众在运粮中也增加了收入。但是1942年粮食出口过了火，一部分公粮也出口了。1943年发生了大灾荒，粮价大涨，西线收不进粮食，拖欠的公粮无法归还，根据地粮食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因此对粮食贸易的争论发生了，如何估价四十多年前的这场贸易斗争呢？现在大家的看法已取得一致：成绩是巨大的，应该肯定，但因经验不足，没有瞻前顾后，特别是高额利润在头脑中滋生，无节制地大量出口便造成了被动局面。

相当多的研究者，对根据地物价所以能保持相对稳定，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见解，这就是赖于发展生产，调剂供给，控制货币发行量，组织输出入，争取有利交换，掌握外汇等，工作获得了成功。历史是一面镜子，可资后人借鉴的东西很多。商业贸易的深入研究，是可以给人以启迪的。

（九）关于根据地的银行和货币

敌后根据地史的研究已深入到银行领域，历史留下来的各根据地银行资料，有的比较完整，有的则很分散。值得高兴的是，许多当事人已写出了专题论文或回忆录，填补了记录中的空白处。如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工作的片断回忆》中的金融货币部分，黄伊基的《西北农民银行和晋绥贸易总局史实回顾》（《山西党史通讯》1987年1期），方皋《抗日战争中的鲁西银

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都是很有份量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对各抗日根据地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都有简要的论述，还收录了一些银行章程、政府布告及部分领导人的讲话，这部书无论是从文物还是从文献资料来看，都是很有价值的。一些研究者也写了不少论文，如王静然《晋冀鲁豫边区货币金融工作》(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座谈会资料集)，张厉生《晋察冀边区银行》(《南开学报》1983年3期)，黄存林《略论冀南银行的历史作用》(《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3期)，笔者写的《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货币统一》(《近代史研究》1987年2期)等。

研究者的论述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

1.根据地的货币政策。各根据地的货币政策是相同的，这就是发行与巩固边币(或称抗币)，保护法币，肃清土杂钞，打击伪钞。中心的一环是统一货币。货币不统一，边币就不会巩固，边区的金融也难以稳定，边区的经济基础也必然动荡不稳。研究者的文章都抓住了这一主题，表述了货币统一的过程，以及怎样占领阵地，取得群众信任的。象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一样，各根据地的货币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它获得独立的市场和地位比根据地的建立要晚，它的价值作用是和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权威和影响联系在一起的，因各根据地建立时间的迟早，地域范围的大小及巩固程度的不同，对货币政策认识上的差异，各根据地的货币在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2.银行工作的重点。各根据地银行发行工作大致都经历了这样一段认识和实践过程，即最初多属军事发行，主要是财政透支，随后才把重点放在扶助群众的生产方面，主要扶持农业、工业和家庭副业生产。戎子和文章中讲到：“1940年冀太联办成立后，特别是经过1941年的努力，到1942年财政经济工作初

步走上轨道，加上边区减租减息运动和生产运动的逐步开展，冀南币的发行方针逐步明确起来，不单是补助财政，而是兼顾生产，即财政与经济发展并重。”这说明领导者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获得的。各根据地的货币要成为各根据地的本位币，就应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这样才能使根据地的物价保持相对稳定。

3.货币战。各根据地和敌伪展开的严重的货币战，一直持续到敌人投降。抗战期间敌对我经济战线上的掠夺与我之反掠夺，封锁与反封锁，大都借助货币这一工具进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结合在一起。以冀南币为例，一直搏斗了六年，曾有此高彼落，彼高此落多次的比价变化，及彼进我退，我进彼退反复的市场争夺，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探讨这一课题中，研究者使用了银行的卷宗，运用数字和图表来说明货币的发行指数、物价指数及货币购买力，使人对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有清晰的了解。

研究在走向深入。一些问题也提出来了，如边币应稳定在与法币的比价上还是稳定在物价上。华北执行的是金融货币独立自主的方针，将边币稳定在物价上，陕甘宁边区也曾主张稳定在物价上，但未实行，为什么？又如金融政策中的利息政策，抗战时采用低息政策，特别是农业贷款是一分半，合适不合适？对发展生产的影响是什么？

一个课题一经提出，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出现更多更好的成果。经过多次的研究，人们的认识也就深刻了。

三、根据地史研究的广阔天地

根据地独特的历史魅力是很吸引人的，对它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一）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获得了同样的学术价值，有的研究还需要提高；（二）研究还没有深入到根据地的每一个领域，（三）就根据地的伟大存在及其应享

有的历史地位来讲，现在的成果委实不多。研究仅仅是个开端，许许多多的课题等待着人们去探讨，许许多多的资料等待着去发掘和整理，这是一个广阔的园地。

研究历史主要是依据历史文献。目前发表的文献资料不少，而我们探讨某一问题时，总是感觉到资料不够。获得资料的途径，一是到各地的档案馆去查找，那里保存着大量可供利用的档案，许多资料至今仍在沉睡。曾是根据地地区的市、县档案馆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1987年10月，财政部科研所的领导组织我们研究晋冀鲁豫根据地财经史的同志一行十余人到原太行太岳根据地的邯郸、武安、涉县、黎城、左权、武乡、沁县、沁源考察，发现这些地方保存着大量的根据地原始资料，有的属于敌我双方的军事政治情报，有的属于社会调查，一个村的或一个市镇的。也有农、工、商方面的资料。银行方面的资料。其中有的是手抄本，有的是稀有的刊物，是研究根据地不可多得的文献。我们应当把目光转向当年的根据地地区，从那里吸取丰富的养料。二是翻阅根据地的报刊。抗日期间新闻事业特别发达，各根据地有许多报刊，仅冀鲁豫边区主要党刊党报即有：《党的生活》、《冀鲁豫日报》、《战友报》、《战友月刊》、《战友文选》、《火花报》、《挺进报》、《抗战报》、《前锋报》、《烽火报》、《火线报》、《党内刊物》（月刊）、《党报》（三月刊）、《军区党报》（周刊）、《军区刊物》（月刊）、《军政文选》（月刊）、《分区党报》（旬刊）等。令人高兴的是，各地区的几种大报刊已影印出版，如《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晋绥日报》、《大众日报》。它们都是根据地史的记录，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素材，其中许多政策法令、历史事件都有报导，和档案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的比档案记载详尽，或者是档案中没有的。还有一些珍贵刊物，如《工商通讯》、《经济通报》，是研究太行根据地经济的重要资料。《平原》、《战友月刊》、《工作通讯》、《工作研究》是研究冀鲁豫边区所不可缺少的。

因为战争的残酷，根据地资料没有完整的保留下来，许多事没有文字记载，仅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所以，调查访问就显得十分重要。晋察冀财经资料和财经史稿的编写过程中，曾走访过很多当事者，弄清了一些档案上查不到的问题，如贸易路线、商业网、商号和集市贸易。开始时，一无所知，是忻县韩成贵提供了线索，他是当年商业干部，对北岳区商业了如指掌。有关军工的资料，也多来自走访，原晋察冀军区工业部长刘再生提供了大量资料。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撰写关于“无人区”的时限与地域范围，是花了两年多时间，走访了各个“无人区”，才弄清和完成的。

事实说明，调查研究在研究根据地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全面地认识有关历史现象，这是研究根据地史，也是研究现代史独有的优势。当然，无论是调查所得的资料或历史文献，在使用时都应加以认真的思考，只有通过解释和理论的提高才能具备历史见证的作用。研究任何具体问题，都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用宏观的眼光去观察。

考证是研究根据地史不可缺少的手段，应利用同一问题的不同证据来推求比较，考察自己掌握的资料是否有缺陷和不足，尽可能地使自己的研究立于可靠的基础上。

研究工作是很艰苦的，有时为一个人的生死年代，为一个地方的具体解放日期，为某个地区的行政区划的变动，或者为一个数目字，都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从各方面核对，才能弄清，甚至弄不清。档案文献或报刊上的记载出于当时种种缘故，与事实有时有出入。如左权将军的殉国日期和地点，报上登的是1942年6月2日在麻田附近，实际上系1942年5月25日在麻田十字岭。历次战绩统计数字，史料记载很不一致。大体说来，1943年以前，多有所夸张，1943年以后比较确切。

研究者不应忽视资料整理工作，不要以为整理资料是低层次

的工作而绕过它。从文化积累角度来看，这个工作意义很大。就一般规律来说，现时的论文，只是代表着现实的水平，虽然对后人有启迪和借鉴的作用，但无论多么精辟的论著，都受时代和知识的局限，终将为后来的成果所丰富补充或代替。而原始资料则相对稳定不变，对它们的整理保留和发掘丰富，是后人研究的永久基础。研究抗日根据地，也必须重视各地区各部门各类别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等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逐步精深，并不断发现新的课题。当然，绝不能停留和陷入于资料之中，文章也不能只是纯粹的叙述，应把自己积累的东西条理化，上升到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研究。利用史料找出历史规律，才能体现历史研究的意义。

根据地史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它必将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